

意大利文艺复兴 的历史背景

丹尼斯·哈伊著

李玉成译



意大利
文艺复兴的
历史背景

丹尼斯·哈伊著
李玉成译

插图·前言·附录三联书店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

YIDALI WENYI FUXING DE LISHI BEIJING

〔英〕丹尼斯·哈伊著

李玉成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73,000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定价 2.00元

ISBN 7-108-00126-8/R·15

中译本序

1959年11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召开了一次有关文艺复兴的重要学术讨论会，与会者都是国际知名学者，除了历史研究本身而外，这次集会还是对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出版一百周年的纪念。然而，这次大会在近几十年的文艺复兴研究史上的意义，倒不仅仅在于它所讨论的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文艺复兴研究在本世纪中期出现的一次方向性的转折。原来这次大会对几十年来文艺复兴研究在政治、哲学、文艺、科学各方面的史学进展作了回顾，认为它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经历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批判浪潮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综合。会议主持人希尔顿在会后出版的文集上着重指出：“我们召集此会是抱着如下信念：对一个世纪以来文艺复兴各方面学术研究的考察将表明，我们现在已完成了一个正——反——合的发展过程，并取得了艰辛获得的意见与已普遍流行的意见的一致。与会的讨论和报告完全证实了我们这个信念。”这个正、反、合的发展，尽管具体解释各有不同，但无疑标志着文艺复兴研究在二次大战后的巨大进步。为这一新综合作出重要贡献的，除了本书经常提到的美国学者汉斯·巴

伦和克里斯特勒等人而外，英国学者中就包括本书作者丹尼斯·哈伊，而意大利学者中的杰出代表则是为本书意大利文版作序的欧金尼奥·加林。

丹尼斯·哈伊生于1915年，193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在格拉斯哥、南安普顿等大学任教，1945年起任爱丁堡大学讲师，1954到1980年一直任该校中世纪史教授，1980年后任名誉教授至今。他还担任过英国历史学会主席（1967—70年）和爱丁堡大学副校长（1971—1975年）等。从五十年代起，他便成为英国研究文艺复兴的重要学者之一，主编《剑桥近代史新编》第一卷（文艺复兴卷），包括1957年的初版和1976年的新版。除了许多专门论文外，本书是他最为人知的代表作。另外由他编撰的文艺复兴专著尚有《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1966年），《文艺复兴时代》（1967年）以及《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教会》（1977年）等等。

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加林的意大利文版导言已说得比较清楚。当然，他的评价只是从资产阶级学术传统而言，我们对此应有所认识。若就西方的研究情况而论，一百多年前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我国已有中译本）无疑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作，它对文艺复兴的时代特点和作为近代文化源头的性质都作了突出的论述，基本核心是正确的。但布氏及其一派在史料和具体观点上仍有不少疏漏之处，因而从二十世纪初年以来遭到各方面严重批驳，其中极端一派甚至全面否定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时代的意义，这显然是把小孩和脏水一块泼掉了。哈伊等人所代

表的新的综合则是象加林所说的那样，从批判中又“回到”布克哈特的传统上来，因而是一个正、反、合，在新的水平上发展了文艺复兴的研究。因此本书对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时代的意义作了反复的论证，但又相当谨慎小心，带着某种“讽刺意义的保留”，很注意揭示历史背景的复杂与矛盾情况。因此，尽管书中许多具体论点犹待商榷，它作为反映当代西方文艺复兴研究的一个新的，而且也是比较正确的成果，仍是值得介绍给我国读者和学术界的。

本书初版于1961年，以后多次重印，1977年出了第二版。意大利文译本初版即有，1978年又出了据第二版增补并由作者审定、加林作序的意文译本。我们很高兴请到李玉成同志根据1978年意文版译为中文，校阅时则除意文外还根据了英文原本。我们之所以选意文版，除了因为书中不少引文和人名、地名、书名都是意文，翻译较便而外，也觉得它较好地体现了哈伊和加林两人在学术上互相呼应的关系。有趣的是，在意大利史学界于1977年庆祝加林学术活动而出纪念论文集之际，哈伊又应约写了《近二十五年来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一文相贺，其中较详尽地谈到了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情况，对加林和意大利史学界也作了很好的介绍，我们特译出以作本书附录。

朱 龙 华

北京大学历史系

目 录

意大利文版导言	• • 欧金尼奥 • 加林	(1)
初版序言	• • • • • 丹尼斯 • 哈伊	(11)
意大利文初版序言	• • 丹尼斯 • 哈伊	(15)
再版序言	• • • • • 丹尼斯 • 哈伊	(16)
第一章	引言	• • • • • (20)
第二章	作为欧洲历史时期的 文艺复兴	• • • • • (28)
第三章	意大利的历史问题	• • • • (42)
第四章	十四世纪意大利的 政治和文化	• • • • • (70)
第五章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 价值的特征	• • • • • (108)
第六章	意大利迎接文艺复兴	• • (150)
第七章	北欧各地接受文艺复兴	• (177)
注 释	• • • • •	(200)
附 录	近二十五年来对文艺复兴的 研究	• • • 丹尼斯 • 哈伊 (246)
译后记	• • • • • 李玉成	(283)

意大利文版导言

一、正如本书作者在 1960 年前后完成此书时所指出的那样，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著述在最近数十年间正在迅速地增长。尽管我们掌握有相当完善的图书资料，要阅读这些著述已越来越成为艰巨的任务。关于某些特殊问题的专著和多卷集在成倍增加。各种专门刊物收集了大量图文并茂的文献。可是与此同时，并没有出现相应的、能够把政治事件和思想动态联系起来考虑的新的综合性著作，使我们通过这样的著作，对这一时期中各个领域里的文化和艺术所取得的进步获得一个完整的图像。当然，在一个史学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修正过去的观点、并常采用新的方法对陌生或不同的文献进行深入分析的时期，进行这种综合工作可能显得为时过早。可是，不做某些总的探索，不仅不可能把发掘工作推向前进，而且还可能丢掉某些实质性问题，以及那些对专题研究具有启发性的问题。近来所出现的相当数量的思想贫乏的作品，不是偶然的。这些作品几乎都陷于无益的夸夸其谈，或对其益处尚属可疑的逸闻琐事的考证中。

因此，在这部富有特色的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

著作里，丹尼斯·哈伊的简洁和明确的阐述至今还占着特殊的地位。正如作者所回忆，此书的梗概追溯到1957年，原为讨论会讲稿，其特征不仅在于表达冷静，不务虚词，语言朴实，观点明确，避免空泛和似是而非的议论，而且力求把思想的活动同事件的实际联系起来，描写细腻但又界限清晰。此书的首要功绩在于：作者以冷静的，时而也以参与的目光试图对意大利政治和文化的变迁作一概括性的描述。

总的说来，正如作者所回顾的那样，他对布克哈特杰作的态度的反复变化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1932年作者饱含热情地首次阅读该书，宣称发现了一个“新的历史领域”，一种新的“对待过去的态度”和寻求一种“全面的观点”。继而，在第二次阅读时便产生了强烈的批判情绪。最后，又恢复了对该书的日益增长的景仰。哈伊引用了乔凡尼·迪·萨利斯布里挖苦贝尔纳尔多·迪·沙特勒兹的一句名言：“侏儒比巨人看得更远，仅仅是因为他们站在巨人的肩上”。〔1〕如果我们今天比布克哈特看得更远更清楚，大部分功绩也应当归功于他。

需要指出的是，哈伊的自述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它反映了在那些年代中或先或后从事研究这些问题的不少人所处的思想状态，尽管他们过去都批评过，甚至激烈地批评过布克哈特的局限性，但都无例外地“回到”赞扬他的著作上来了。

这种情况从另方面讲，并不意味着哈伊的这本书是为

布克哈特而写的，或是表示“回到”布克哈特的理解上来。这不仅因为本世纪的历史家们在对待文艺复兴的态度上同十九世纪的历史家们相比已有一段距离（这点观察很重要，需要回头来再讨论它）。丹尼斯·哈伊的著作虽然内容丰富，但他在实际上并不希望去进行布克哈特式的综合，即首先着重于重大的思想问题的研究，期望通过各个基本阶段来阐明历史发展的主要途径，以求获得决定性的“发现”。史学家哈伊在这里进行的是笛卡尔所说的那种有限的“探索”，即有条不紊地和尽可能广泛地向读者介绍能够接受的结果，而不是相互冲突的强加于人的观点。这里并非没有思想内容，而是那些通过了所有分歧仍然是明确的思想内容。由于它们在辩论中经受了考验，也就能更可靠地为我们指明方向。

从写作方法上看，哈伊的作品还有一个积极的特点，即坚持对一个历史进程进行分析，抓住和阐明其内部情况，而许多人对此是以过于简单化的方式进行处理，把它们变成单一的模式。作者不仅描写了首先在意大利，其次在欧洲和北欧的不同城市、国家和地区中所表现出来的地方色彩的多样性现象，描述了它们怎样逐渐放射光芒、扩展和衰落的情况，而且指出在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欧洲文艺复兴之间，从数量上讲所出现的不成比例的现象。实际上哈伊也是研究波利多拉斯·维吉尔的学者和出版家（1952年在牛津出版了他的专著《波利多拉斯·维吉尔，文艺复兴史和文人》）。他是以某种方式从十六世纪意大利“知识分子”的

迁移开始，从外围追溯到新文化方向的辐射中心。〔2〕

二、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对把文艺复兴的文化方面的情况同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情况割裂开来的倾向；与此相反，作者要把文明的历史事件、同人物、同“真实”的形势紧密联系起来。毫无疑问，要了解所说的这些学者、艺术家是什么样的人是很重要的。要知道他们是属于哪一个社会集团和阶级，他们为谁工作，他们的作品面向谁，在什么样的圈子里产生影响，以及他们生活在怎样真实的“历史”形势中。哈伊的步子总是迈得非常小心和谨慎的，〔3〕他知道习惯上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个字眼是个正在争论和可能引起争论的字眼。这个词在习惯上首先是指文化方面的情况，如果愿意，还可以加上对人的教育和教育方式（方法）。作者为了更有效和更切合形势地说明问题，他深入探讨了文化领域的很多方面：造型艺术、建筑、文学、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尽管这方面问题很复杂）。

如果认为人文主义学术研究只是纯“经院式”，甚至纯修辞学的性质，反复强调人文主义者只不过是学校的教师，而且是语法和修辞学的教师的话，那么就要弄清楚，“修辞学”的最初的、丰富的含义，才是有益处的。可以说，他们以自己所从事的活动和采用的方式确立了各个“学科”间的新关系，建立了新的文化权威，并由此而产生了文化发展上的新趋势。这种新趋势首先使意大利，其次使欧洲各种广阔的生活和知识领域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或革新，并且明显地对继后的几个世纪产生了影响。〔4〕这是一个把研究古典

文化、复兴希腊—罗马精神遗产，同当时的历史事件与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文化和教育上的革新。而这些事件与活动的范围是大大地超出了意大利学者们或豪华的城市宫廷生活的狭小圈子的。

很难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活动同欧洲历史决定性年代里的一切趣味、感觉、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方式的变化截然分割开来。要确定一个时期文化活动对整个生活所产生的不可否认的干预过程并非易事。为了理解看来已很遥远了的现象和事件，把这幅变动的图像再现出来是必要的。很明显，对不从表面看问题的历史家来讲，为了寻求理解人和现实的新方法，在确定理论和实践之间、基本观点同技术上的看法之间的原始的和丰富的联系时，甚至需要恢复被长期废置或中断了的技术，即让先前存在但还贫乏的科学直觉在不同的形势中，在文化革新的气氛里得到复活和发展。但是人们在读了大量片面的“思想史”和单向的发展观之后，也常常喜爱否定旧的模式，时而强调技术，时而强调社会经济状态，不经过必要的鉴别，不研究人类活动从一个方面到另一个方面的复杂的中介过程，便匆忙地把各个方面和不同形式的问题组合起来。在对历史“时期”进行阐述时，很容易把它变成一个单纯的称谓，并且很少能对总的界限和表面上时常出现的相互矛盾的情况提出结论性的意见（对“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不少分歧正在变成一种纯粹咬文嚼字的争论）。人们往往忽视，具有特征的因素可以表现为在其内部交织着旧的

冲突或旧的不协调的新形式。新的事物并不总是包含着新的内容,而有时表现出来的矛盾和斗争也并不是新的。“家庭”的解体、经济危机和某种风俗的退化都启发了列奥·巴蒂斯塔·阿尔伯蒂采用近乎斑驳陆离的色调。如果我们愿意这样说的话,“新事物”及其特征并不在于它哀叹衰亡中的世界,而是在于它对生活所持的戏剧性看法,即认为在道德和幸福、无动于衷的命运和人的决定、自然和愿望、人和神、以及理智渴望永远建立的东西和不可避免走向衰亡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冲突。

当然,对那些喜欢简单公式(文艺复兴反对中世纪,人文主义反对基督教)的人来说,将不会在文艺复兴和反对文艺复兴之间,以及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之间寻求益处甚少的对立论点,或是进行模棱两可的猜测。他们为了用自己先入为主的思想来抬高(或贬低)某种文化,不幸地坚持认为在文化发展和经济、政治危机之间,在文学繁荣和科学停滞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性。实际上,要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特征就不能不包括它的冲突、困难、不和,以及在对抗中各方面的戏剧性变化。这些冲突并不总是注定会在和谐的平衡中平息下来,而是常常发展到悲剧性的爆炸地步。艺术家的某些优秀作品,文学杰作中的某些双重性,和某些含义深刻的理论著述正是从一种极其紧张的形势中获取力量的,而这种紧张的表现形式达到过去从未有过的人所共知的程度。

三、哈伊教授的功绩还在于认为需要了解文艺复兴的

所有方面，但也坦率地承认其中的“荒谬”部分（“这个荒谬时代的表现之一似乎是文化的变化超过了经济变化的步子”），即是从时间上讲经济上的繁荣同艺术、文化、政治上的进步并不严格相互吻合（如果需要，这点证明需要收集一切相关的复杂情况，它们之间无疑存在着既真实而又不是简单的联系）。哈伊在他的著作中谈到，在研究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时，所遇到的困难并非是单一的。“文化”领域内部的联系和比例也相当复杂。这里首先要明确，不要把现在用来理解和区别各种活动和不同学科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模式套在过去的头上。当时的技术、科学和艺术的相互联系和表现方式都是大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界限也不一样。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的典型特征之一正是反映在这样的关系上，反映在确定这些常常处于深刻变化中的分界上。

这样，哈伊指出了技术和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它们可能比文学和哲学发展更为缓慢的原因。^[5]但他也说明了某些明显的例外，如“透视学”不仅在“绘画”（绘画透视）中而且在一般光学中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谁研究它，他便立刻被迫面临其他方面的问题。在建筑、城市更新、城堡建造、水利工程、航海和探险等不可否认的发展领域里，他会惊奇地发现技术和科学不可缺少地交织在一起的其他重要进程（和进步），很难低估或过于孤立地来看待如象菲利波·布鲁内莱斯科、里昂·巴蒂斯塔·阿尔伯特、保罗·托斯卡内拉和列奥那多·达·芬奇的“情况”。人们很难忘记某些对病理解剖学的研究，某些对新的希望和

方式的探索。正如很难忘记由于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们的努力，一些在中世纪并非不知名但影响甚小，传播有限，如象阿基米德那样的作家对当时物理—数学的文化活动所具有的影响。有些史学著作倾向于突出物理学在某些特殊领域里的成就，而贬低在其他并非不重要的科学领域里所进行的工作。他们忘记了知识并不总是在同一领域里向前发展的，同一学科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处于领先地位。逐渐用现代模式来理解过去（同样又用历史的模式来理解现在）的隐蔽的危险严重地阻碍着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和技术进行正确的评价。更有甚者，带着同样思想的具有科学素养的学者比具有历史素养的学者对史实更能作出（或多或少的）奇怪的歪曲，其中对列奥那多的活动的歪曲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人们将不会忘记在边缘领域里曾有过一场热烈的讨论和研究，以及在弄清楚那场讨论的积极意义时所遇到的困难。这些领域后来被排除在理智知识的范围之外。如象魔术、炼金术、占星术等“科学”，它们经过内部发生的对古代“技术”和对真实进行遥远想象的深刻危机，开始取得在研究、实验和看法上的重大进展（不用指出，由于思想上显而易见的忧虑而进行的最可悲的努力是想证明加利略的真正老师，甚至加利略本人正是加利略回忆录中的辛普利奇奥）。

四、无需多说，这是一个对西方文化关闭的、“脱节的”发展作出显著贡献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应当采用为了解过去所需要的翻译手段和技术手段来研究它。幸运的是，

哈伊在翻阅了十九世纪历史学家的著述之后指出：今天的历史学家在对待文艺复兴问题上已有不同的起点。在接受认为足以说明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发源地到它在欧洲最远影响的时代分期的时候（“我同意在1350年至1700年间存在着文艺复兴的事实”），哈伊也指出问题的界限，超过这些界限不仅对现实的理解，甚至人的理念都会衰落。这个历史学家引人瞩目的观点还在于，他指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正是对以下方面作出了贡献：培养和教育一种类型的人，形成某种方式的共处关系，建立共同文化遗产，确定人类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历史。很明显，这是指一种已不处于今天欧洲文化发展中心，已不构成现代模式的“人”。在现代模式上，长期以来已形成一些集团，他们在欧洲国家的活动中，并通过欧洲在全世界起决定性的作用。^[6]本世纪以来，很多观念已发生了变化。今天，“人类”的理想同十四和十六世纪的古典文明相比，即使从高尚的和“古典的”意义上讲，在很多方面已显得遥远和脱节。其次，这种脱节就是对应于现代科学而被称为加利略的科学曙光来说，也无太大区别。

由于一贯明确这种遥远性，因此作者在对待“现代化”这个问题上持谨慎态度。这也是这本全面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的并非最末的功绩之一。

五、最后，还要补充说明一点。丹尼斯·哈伊在1976年2月介绍此书的新版时，曾愉快地指出：他仍忠实于他的这部作品和他所从事的工作。他坚持在基督教“传统”教育和人文主义的孕育中存在着连续性，驳斥反对“在中世纪和

现代之间进行无意义的划分”的同时，也反对“强调”把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时代”概念的倾向。“应当以某种带讽刺性的保留来对待文艺复兴”——他说。毫无疑问，在基督教的教育同人文主义的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联系，应当克服某些根本性的割裂，以便恰当地使“文艺复兴”概念的本身“历史化”，并把它置于有效性的范围之内。^[7]但是，一项不愿以意识来代替意识的无偏见的调查表明，如果要批判“无意义的划分”的话，不能不揭示在十四至十六世纪之间所大量采用的“传统”教育以及生活、思想方法上的改变是同意大利相当多城市面貌的变化相一致的。正是对“再生”问题的研究更好地表明了这种起因已伴随了多少世纪，它既不是作为活动的意识过程，也不是作为愿望、纲领、思想和计划，而是作为自然，作为存在的现实，它有效地作用于社会并逐渐从根本上同样地改变着社会的形式和内容。

把概念历史化的工作至今已开始很久了，我们的德利奥·坎蒂莫里从三十年代起对此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项工作越来越清楚地揭示了在某个时候获得了不可忽视的某种力量的思想的遥远根源。这种力量甚至可以变为具有奇效的“神话”。为了让“历史”摆脱空洞的抽象和有意的“脱节”，历史学家哈伊在带讽刺性的脱节之外，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点。对此，哈伊的这本书希望能成为一个榜样。

欧金尼奥·加林

1966—1978年于佛罗伦萨